

论宋代药材的种植与贸易

史泠歌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在宋代,药材种植业已成为农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其种植人群之多,种植规模之大、技术之精,商业化程度之高皆超过了前代。宋代医学的进步,商业流通的发展,都促进了药材种植业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独立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种植行业。商业化的宋代药材种植业打破了自然经济在种植业中的独霸地位,成为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标志,在中国药材栽培发展史与药材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宋代;中药材;种植;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9)03-0087-05

药材种植,在我国历史悠久。后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便记载了胡麻、红花等药材的种植方法^[1]。隋代时出现了《种植药法》《种神草》等药材种植专著^[2],中唐以后,药材种植趋向于向商业化发展,但药材种植业的真正兴盛,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植行业,则是宋代。如“药户”一词,出现在唐代^[3],然而作为专门以种植药材、出卖药材为生的农户的特定称谓,却是在宋代^[4]。宋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药材需求日益增长,促使更多人群参与药材种植活动;相当数量的药材被生产出来,进入商品市场,又促进了药材交易市场的发达。宋代的药材种植与贸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5-9],对有关宋代药材种植的史料进一步分析探讨,更好地为今天提供历史借鉴。

一、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药材种植

宋代,药材种植的发展,离不开药户这支主力军。例如宋代首先大面积种植药材的四川绵州彰明县,其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四乡共有田 520 顷,其中的 104 顷种植了附子,占四乡总田数的 20%,“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10],四乡所收附子达 16 万宋斤以上^{[5]162-163}。彰明县大面积种植附子数据表明,当地有相当数量的专业附子种植户。两浙路“地狭而人

众”^[11],药材种植便成为在固定土地上获得更大收益的较佳选择。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药材种植业成为继桑蚕业、种蔗业、种花业之后,农户的又一“生业”^[12]。如陆游所居山阴县,药园很多^{[12]1523}。

宋代“达则愿为卿相,穷则愿为良医”^[13]的观念,也促使更多的士人参与药材种植活动:“百药吾谁辨,农皇旧有经。倾金购善种,按谱验真形。”^[14]熙宁六年(1073 年),司马光致仕后居洛阳,买田二十宋亩,“辟以为园”“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堦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15]。司马光在“采药圃”“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锄,购买屡倾橐。纵横百余区,所识恨不博。”^[16]李復体弱,“两岁苦病啜”“饱闻食罌粟,能涤胃中热”。恰逢好友赠种子,李復“堂下开新畦,布菽自区别”,高兴地将罌粟种下,详细记录了罌粟的种植、生长过程^[17]。

南宋人陆游在绍兴府镜湖附近居住时,辟“小园五亩”,其中即种有药材^{[12]642,1124}。陆游“逢人乞药栽,郁郁遂满园。玉芝来天姥,黄精出云门”^{[12]687}。天旱时,陆游“引泉浇药圃”^{[12]1803};小雨时,“荷锄分药品”^{[12]1820}，“泥融幽径药苗肥”^{[12]1143}。在陆游和家人精心侍弄下,药苗长势良好,夕阳映照下满园葱郁。据载,宋理宗时朱继芳在福建山种植药材,“春到寒蓼

收稿日期:2019-03-26

作者简介:史泠歌(1978—),女,河北保定市人,教授,历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宋史。

总向荣,药苗旋种亦初成”“种药千畦手自锄,年来渐喜识人踪”^[18]。

宋代医僧很多,种药材的僧人亦不少。北宋睦州僧人思允“佛学之外,兼妙岐黄之术”。当地人为思允增修了“灵香阁”五间,阁中“药栏、花圃,前后相望”^[19]。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江南东路的绩溪县天旱不雨,僧人元立在县治东北三十宋里的石金山“祷雨”后,“乃作室于山之左肋,力田种药,奉香火焉”^[20]。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致仕居杭州的薛昂,“以花药圃施吉祥慧观大师”,便于种药^[21]。正因为宋代寺院种植药材现象普遍,故当有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潞州潞水和尚便回答:“还见庭前华药栏么?”^[22]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陆游任福建提点刑狱时,游览洞宫山天庆观(今福建省政和县杨源乡洞宫村),记载了道观种药之事:“道士昼闲丹灶冷,山童晓出药苗肥”^{[12]10},“种药满山巅”^[23]。如深受宋太宗优待的陈抟,在华山隐居时,便“种药茅庭畔”^[24]。

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参与药材种植,故宋代城乡皆有药材种植。城市“陋巷”中“荒畦整药栏”^[25],山村则“月转药栏阴”^[26]。山涧前,“瀑布溅珠过药栏”^[27];江溪岸,“风雨药栏西,残红落锦溪”^[28],“晚向江头看药栏,花前一笑聊开颜”^[29]。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宋代药材种植地域的广泛性。

二、发达的中药材贸易市场

北宋川峡四路“土植宜柘”“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30]。兴于唐末的梓州药市以九月九日为期,宋仁宗天圣中,“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4]226}。益州药市,“期以七月七日,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备,凡三服而罢”^[31]。《说郛》卷62下北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说,当地“九月药市”。另说“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32],时间有异。若论药市数量多者,当属成都药市。据载,每年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五月五日,为观街药市;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33],一说为天中(五月五日)。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34]。重阳药市与“元夕灯山”同为“万人乐处”^{[12]2473}。正如宋人汪元量在《药市》中说:“成都五日,家家列药于市,以为盛事。蜀乡人是天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35]。药户、药商从四面八方赶来,“远近

凑集争赍担”^[36],川芎与大黄等药材“如积,香溢于廛”“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37]。

南宋时,成都药市规模日趋盛大,商贾云集。“海贾冒风涛,蛮商经峯嶺。厚利诱其前,颠沛不遑恤。小亦挟千贯,多至金百镒”^[38]。市场上交易的药材品种繁多,“席地堆雄附,连盘伫参术”^{[38]159}。“开张自寅卯,收拾过酉戌。富豪盛僮奴,羸老携儿侄。车马浩骈填,空然皆迸溢。晚饮各酩酊,归装满箱帙”^{[38]159}。

两浙路、江南东路是“宋代农业高度发展、手工业产品最为丰盛的地区,因而这一地区的商品流通和交换尤为兴盛”^{[5]941}。会稽开元寺正月灯市时,“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39]。南宋都城杭州的药市,位于炭桥^[40]。明州药市亦是“杵声喧药市,栏影枕渔舟”的繁忙交易情景^{[39]6278}。西南地区的施州药市,“通宵都有药材交易”^{[9]19}。

广布城市的药肆、药铺,也是药材交易的重要场所。北宋都城开封,药肆众多^[41]。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孟元老亦说:“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傅药铺,直抵正系旧封邱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栢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42]“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张戴花洗面药、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丑婆婆药铺”“荆筐儿药铺”“熟药惠民西局”“盖防御药铺”^{[42]275}等。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清代画院本中,可见到“人参,本堂蔡兑川广地道药材”等内容,“可知道宋代药店除卖药外,还兼营药物中转、兑药材,促进南北方药材交换和流通”^{[8]27}。

南宋都城杭州,也是药肆林立。如《食治通说》的作者娄居中,便是杭州“金药臼”药肆的经营者^[43]。宋孝宗“食湖蟹多”患痢疾,为他治愈疾病的严姓民间医人,便来自“小药肆”^[44]。会稽“地产紫石英,都下(杭州)及吴中药肆所卖紫石英,皆此石也”^[45]。衢州开化县“山间多春兰”,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药肆皆收货”^[46]。“蜀人多种菊”“郊野之人,多采野菊供药肆”^[47]。经营药肆,收益颇丰,吸引了社会各阶层投身药材贸易。北宋臭名昭著的朱勳父朱冲“微

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生理日益进”^[48]。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之父“故农家子，后以市药为生”^[49]。南宋抚州人陆九叙，“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陆九叙“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50]。宋宁宗时的荆、鄂都统制张威从军前，亦是“贫甚，卖药自给”^{[30]12214}。贩卖药材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许多农民“卖药以代耕”^{[12]1709}。商人逐利，药材贸易自然不甘落后。“自宋世，吴人不畜妻子，唯货药以给朝暮”^[51]。四川附子收成后，各地药商蜂拥而至，“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10]682}。

药商、药贩活跃在药材产地与交易市场，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樟镇药市，到了明代有药码头之称，清时为南北川广药材总汇之所，享有“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之美誉^[52]。宋代有些综合市场中，也有药材交易，如开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殿后资圣门前，即有“香药之类”^{[42]288}。成都府“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因市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53]。

南宋时草市“勃兴”^[54]。荆湖北路的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是当时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55]，其南草市是大型市镇的标志^[56]。在这些草市镇中，自然不乏药材交易。如“吴侬之野”的佃户“携米”“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药饵之属”^[57]。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自绍兴赴任夔州通判，途经蕲口镇（今湖北省蕲州市西南）时，在蕲口镇监税高世栋陪同下，“买熟药于蕲口市”，“药贴中皆有煎煮所须，如薄荷、乌梅之类，此等皆客中不可仓卒求者。药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12]2438}。即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辰州，在“草市人朝醉，畚田火夜明”^{[33]805}的热闹与喧嚣中，亦不乏药商活跃的身影。

在药材产区，药材更是草市交易的重要商品。前面提到的彰明县附子收获后，“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10]682}。潘阆诗句“货药村桥醉，收帆野渡眠”^[58]，描绘的则是江南地区药商乡村收购药材的场景。两浙路嵊县浦口（今浙江省嵊州市），“卖药村村

市，炊粳处处家”^{[12]1956}。江南西路临江军樟镇（今江西省樟树市），地处赣江、袁水之交，“此地三接浙”，交通便利，成为当时的药材集散地之一^[59]。杨万里路过樟树时，适逢药市结束，“日斜秋树转，市散暮船忙”^[60]。

三、宋代药材需求增加促进了药材栽培技术提高

宋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药材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药户提高草药种植管理技术，增加药材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宋人寇宗奭提出“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61]。如大黄须种植在冬季有低温的冷凉地区，才能正常生长。故“三蜀膏腴地，偏于药物宜”^{[15]91}，药户就因地制宜地种植大黄、黄连等药材。两浙路临安府於潜县盛产优质白术，“以其盘结、丑怪有兽之形”，因号为“狮子术”^[62]。明代仍以白术“产於潜者佳，称於术”^[63]，当地农民多以种此为业。种药时间也非常关键。“小雨半畦春种药”^[64]，“雨蓑春种药”^[65]，决明、附子等大多数药材都须春季种植。罌粟却须秋种^{[37]560}，种子“在八月中秋日下土”^[66]，药苗长出后，须细心管理^[67]，“种药怜苗润，分畦戒蔓滋”^[68]。宋人在药材种植实践中，还注意到粪肥对草药的成长和产量具有重要影响^[69]。如种罌粟时，“宜大肥，则明年夏月花茂，否不及矣。亦宜盖以毛灰，免令虫食其子”^{[66]780}。

宋人已掌握较高的野生药材移栽技术，如施州即有人工栽培黄连者^{[6]29}。邵雍《药轩》诗中，提到野生药材移栽：“山里药多人不识，夫君移植更标名。”^[70]进山采药之人，经常接触野生药材，有机会移植野生药材，并成功培植推广，增加了药材产量^[71]。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指出，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使得更多农民有机会脱离农业生产，投入药材种植业当中，使药材种植业“成为与粮食生产相脱离的又一专业性的农业或农业分支”^{[5]162}。可以说，宋代兴起的药材种植业，基本满足了当时对药材的需求；宋代对野生药材的移栽培植，增加了药材的品种与产量，并且对后世药材栽培影响深远，在中国药材栽培发展史与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贾思勰. 齐民要术校释[M]. 缪启愉, 校释.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149, 150, 364.
- [2] 魏征. 隋书: 卷 2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784.
- [3] 彭定求. 全唐诗: 卷 20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150.
- [4] 高承. 事物纪原[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92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26.
- [5] 漆侠. 宋代经济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1258.
- [6] 刘孝瑜. 土家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9: 1-351.
- [7] 韩迎迎. 宋代药材产地、市场及相关问题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1: 1-86.
- [8] 王一平, 王剑飞.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医药[J]. 中国医药报, 2011(6): 27.
- [9] 卢华语. 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初探[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1(4): 18-25.
- [10] 赵与峕. 宾退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5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81-682.
- [11] 倪朴. 倪石陵书[M]//宋集珍本丛刊: 第 59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545.
- [12] 陆游. 陆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124.
- [13] 章如愚. 山堂群书考索[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8: 1087.
- [14] 强至. 祠部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9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4.
- [15] 司马光. 传家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9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53.
- [16] 司马光. 增广司马温公全集[M]//宋集珍本丛刊: 第 11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553.
- [17] 李復. 滴水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2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4.
- [18] 陈起. 江湖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35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53.
- [19] 苏颂. 苏魏公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 第 12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733.
- [20] 赵不悔. 新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 第 8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668.
- [21]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 第 4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046.
- [22] 释普济. 五灯会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5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72.
- [23] 胡仲弓. 苇航漫游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8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82.
- [24] 厉鹗. 宋诗纪事: 卷 5[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48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55.
- [25] 李洪. 芸庵类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5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8.
- [26] 杨冠卿. 客亭类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6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34.
- [27] 王应麟. 困学纪闻: 卷 18[M]. 翁元圻,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004.
- [28] 许纶. 涉斋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5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96.
- [29] 周紫芝. 太仓稊米集[M]//宋集珍本丛刊: 第 34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764.
- [30]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230.
- [31] 江少虞. 事实类苑[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7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13.
- [32]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73[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658.
- [33] 祝穆. 方輿胜览[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7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940.
- [34] 蔡绦. 铁围山丛谈: 卷 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4.
- [35]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 卷 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38.
- [36] 扈仲荣. 成都文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5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83.
- [37] 曾枣庄, 舒大刚. 三苏全书[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514.
- [38] 度正. 性善堂稿: 卷 1[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7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59.
- [39] 马泽修, 袁楠. 延祐四明志[M]//宋元方志丛刊: 第 7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822.
- [40] 吴自牧. 梦粱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59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5.
- [41] 朱谋塈. 画史会要[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1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61.
- [42]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笺注: 卷 3[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68.
- [43]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卷 13[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90.
- [44] 江瓘. 名医类案[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76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68.

- [45] 施宿. 嘉泰会稽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7044.
- [46] 庄绰. 鸡肋编: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9-10.
- [47] 张杲. 医说:卷8[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287.
- [48] 龚明之. 中吴纪闻:卷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5.
- [49] 何蘧. 春渚纪闻: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97:152.
- [50] 陆九渊. 象山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73.
- [51] 李弥逊. 筠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90-791.
- [52] 聂爱平. 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J]. 文史知识,1998(1):67-69.
- [53] 黄休复. 茅亭客话[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56.
- [54] 傅宗文. 宋代草市镇研究: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36-147.
- [55] 鼓元吉. 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J]. 中国史研究(韩国),2006(40):2.
- [56] 杨果. 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J]. 江汉论坛,1999(12):80-84.
- [57] 方回. 续古今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68.
- [58] 潘闾. 逍遙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69.
- [59] 陈敬. 陈氏香谱[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56.
- [60] 杨万里. 诚斋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785.
- [61] 唐慎微. 证类本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
- [62] 陶谷. 清异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71.
- [63] 浙江通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77.
- [64] 赵师秀. 清苑斋诗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99.
- [65] 陈起. 江湖后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18.
- [66] 高濂. 遵生八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80.
- [67] 韩琦. 安阳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徐正英,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250.
- [68] 许纶. 涉斋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2.
- [69] 罗愿. 罗鄂州小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688.
- [70] 邵雍. 击壤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53.
- [71] 梅尧臣. 宛陵先生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729-730.

On the Cultivation and Trade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SHI Ling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medicinal plant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t has a large number of planting populations, large planting scales, fine technology, and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in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have promot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medicinal planting industry from agriculture and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with a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commercialized cultiv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brok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natural economy in the planting industry and became a symbol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he commodity econom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histor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Keywords: Song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planting; trade

[责任编辑 夏强]